

新中国十七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李 松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既有宏观的跨越性,又有微观的聚焦性。从历时角度看,其内容主要体现为《文心雕龙》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书写。黄海章文学观念的阶段性和时代性与他复杂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体验密切相关,从而历史性地呈现出多种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批评的一致性;政治激进与学术保守之间的张力感;学术个性与思想操守的统一性。从当代文学批评史视野来审视黄海章的文学研究生涯,有必要实事求是地清理他的学术特色和成就,同时也需要不为尊者讳,理解批评者及其观念的时代局限,并且将这一精神财富与经验教训转化为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源。

关键词:黄海章;《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批评简史》;《黄叶楼诗》

引言

黄海章(1897—1989),字挽波,号黄叶,系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侄辈,中国当代重要文论家。黄海章的文学研究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步,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八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他历经九十二年新旧社会的坎坷岁月,其为人学是理解中国文学批评史观念流变的典型性标本。

十七年时期,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马列文论,以及马列文论的本土化产物毛泽东文艺思想。体制内的文学研究,则主要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针,对古今中外文学批评与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围绕黄海章1958年、1962年、1963年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他的批评观念随着时代潮流而变化的过程,通过三个时间点的批评史材料来分析其前后观点的变与不变之处,通过互相印证的一致之处与前后变化的差异之处,理解政治压力对于他的批评思想的影响。总之,从他一生的学术历程的整体性与动态性过程,来理解其真实的文学观念与学术信念。

^{*}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12&ZD166)子课题的阶段成果。

一、人生体验与思想历程

根据知人论世的原则,深入理解黄海章的文学批评观念的前提是,全面了解其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从黄海章如下四个方面的经历和身份,可以理解其知识结构、情感体验、学术旨趣与精神境界。

(一) 青年时期的佛门经历

黄海章年轻时曾经一度遁入空门,据其门生陈平原介绍,其原委是:“先生幼时家境清寒,五四运动那年入公费的广东高等师范就读。毕业时大病几死,后曾浪迹天涯,托身佛门。当年只是依据传闻,偶尔提及,先生又总故意岔开话题;直到近日拜读北大图书馆收藏的《黄叶楼诗》(旅港梅州中学校友会为先生刊行),这种感觉才得以证实。”^①陈平原所提到的诗歌,为黄海章所题苏曼殊(1884—1918年)墓塔七绝中的一句:“我亦人间憔悴客,情怀得似曼公无。”这句诗透露出黄海章对苏曼殊的追慕与推崇之意。“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黄海章在《重题燕子龕遗诗》中凭吊苏曼殊,诗云:

萧疏画笔绝尘氛,逸艳诗编荡客魂。一衲飘然东海去,袈裟泪点尚留痕。
残照荒烟吊五天,神州光复意欣然。兴亡历历萦心曲,热血何曾逊昔年。
五十年来绝赏音,山僧遗墨又重寻。花开花落浑闲事,流水高山自写心。

上述第一首与第二首回顾了苏曼殊多才多艺、放荡不羁、时僧时俗、致力革命的动荡人生。苏曼殊身兼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集才、情、胆识于一身,历尽三十五载红尘孤旅,“一切有情,都无挂碍”这八个字是他人生的写照。黄海章第三首诗表达了对于重获苏曼殊遗墨的感慨唏嘘之意,以“花开花落”写出世事流转、万物皆流的本来面目,以“流水高山”写出任性自然、恬淡超然的境界。黄海章对苏曼殊人生和作品的品评,也有抒心中块垒、自明心志之意。

(二) 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乱世

黄海章经历过战火磨难的艰苦岁月,对日军侵略暴行深恶痛绝。他回忆道:“我在中山大学前后凡历四十余年。中间曾经过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日帝国主义侵占广州前一个星期,在离乱中奔回梅县。1944年日帝国主义又进逼坪石,狼狈地攀上难民车到达韶关,辗转乃回到梅县。我对日帝国主义是非常憎恨的。”^②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岁月之后,黄海章十分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政治使黄海章大为失望。他说:“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是饱受人们轻视的。斯时物价飞涨,纸币低跌,生活维持不易;加以在变乱中流离搬迁,艰苦情形,可以想见。解放后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我仍能在中

① 陈平原.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J].读书,1993(9):146-151.

② 黄海章.漫忆平生[M]//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322.

山大学任课。当时币值稳定,物价正常,生活比以前好了许多,可以多一些时间搞学问。教学也不断地改进,还可以勉强应付。”^①从解放前后不同的生活境况的对比,可以看出黄海章十分珍惜清静安宁的治学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关注民生、体贴民情、励精图治,很多知识分子都衷心拥护,并且在思想上自觉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与改造。这样的思想转向,也许并非完全是被动驯服与思想改造的结果。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黄海章的文学观念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经历了一次次历练和新变。据新华社报道,20世纪50年代初,首都文化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批判,引起了华南地区文化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南方日报》用很大篇幅登载了华南文化界知名学者参加关于《红楼梦》研究的笔谈的文章。“参加笔谈的有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的王起、廖必光、詹安泰、楼榭、黄海章、李镜池等十位教授。他们有的结合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在学术研究上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生活、追求繁琐考据的情况;并指出胡适派实验主义的反动哲学目前在华南文化学术界中仍有影响,现在通过《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进行批判极为必要。”^②该报道认为:“《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之间的斗争,其范围包括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以至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③黄海章所在的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是此次思想清理的重点单位,并由内部讨论为起点组织全校性的报告会。

从1957年9月9日开始,中山大学3000师生继续深入进行为期10天的反右派斗争。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创办了《短剑》《卡丘莎》《红缨枪》《导弹》等10多种战斗刊物。备战、宣传、资料以及串连工作,日以继夜地紧张进行,斗争中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据报道:“像中文系教授商承祚和物理系教授周誉侃等成了这次斗争中的骨干。”^④据《南方日报》记载,黄海章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擦亮了自己的老眼,看透了那些勾勾搭搭、为非作歹的右派分子,也更看清了党指引我们走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⑤目前尚未发现更为详细的资料说明黄海章在反右运动期间的具体心境,仅从现有资料以及之后黄海章对主流文学批评观念的吸收来看,他的确从情感和理性上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深入的理解和接受。

(四)作为沉郁超然的诗人和造诣高深的唐诗研究者

黄海章是学者,也是诗人。他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曾刊行《黄叶诗钞》,该作品传诵一时,后有续作,成《黄叶楼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师孙立评论道:他的七律学少陵,沉郁凝练;五绝学王、孟,含蓄淡远;古体则兼师太白、东坡,超旷飘逸,显示出极高的诗学造诣。黄海章诗学造诣深厚,所作古体诗、近体诗不下数百首,与著名学者詹安泰先生多有唱和。黄

① 黄海章.漫忆平生[M]//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322.

② 新华社.华南、西安和南京文化学术界广泛展开《红楼梦》研究的讨论[N].文汇报,1954-11-12.

③ 新华社.华南、西安和南京文化学术界广泛展开《红楼梦》研究的讨论[N].文汇报,1954-11-12.

④ 中山大学反右派斗争战果巨大[N].南方日报,1957-9-24.

⑤ 中山大学反右派斗争战果巨大[N].南方日报,1957-9-24.

海章在《黄叶楼诗》“后记”中自述其创作追求：“自念从旧社会中来，犹存在不少落后的思想意识，然而抒怀述事，尚不失其真。”^①解放前，黄海章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诗歌，这为后来的文论研究铺垫了深厚的文本基础。他晚年回顾道：“我最初研涉先秦诸子，对《庄子》曾留心看过几番。在中国古典诗歌方面，对唐诗下了一些工夫。在旧中山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时，曾开《诸子通论》、《唐诗概论》等课程。教材由自己编写，交旧中大出版部铅印。改任副教授后，转教《中国文学史》。”^②这一时期，黄海章的古典诗歌研究著述并不太多，但是文本体验、文字细读的功底十分深厚，这从他日后的研究实践与学术理念可以印证。

自1949年至1989年去世的五十年时间里，黄海章在研究唐诗的同时，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他说：“解放后仍和几位老师共同担任这门课程。我所负责的重点，还是在唐代诗歌方面，差能胜任。其后中大中文系开设专门课程，要我担任‘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平昔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也涉猎了一些。课程开设以后，无适当教材可用，不得不自己编写。其后根据这种教材，写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1962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③从黄海章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建立在长期丰富的文本鉴赏的基础之上，同时作为从事创作实践的诗人，他的理论分析往往对批评文本有同情之理解，能避免空蹈虚谈、强作解人。身兼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身份，使黄海章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避免简单套用概念，而是返回历史语境、贴近作品和诗人的实际情况，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学。

二、《文心雕龙》研究

黄海章的文学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批评观念有高度一致的地方，当时绝大多数学者未能完全走出主流话语的总体框架，黄海章并非孤例。本文认为，应该结合历史语境考察其文学思想的起源，从而把握具体的时代性特点。黄海章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中尤其精于《文心雕龙》研究^④。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文心短论”多篇，他的《续〈文心短论〉》一文综合了其他论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黄海章接受并坚持文学源于劳动的观点，他认为刘勰的文学起源论是错误的观点。“刘勰文学起源于自然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艺术起源于劳动，而文学是艺术的一部分，当然不能有所例外。”^⑤可见黄海章接受并坚持文学源于劳动的观点。

在社会发展规律上，黄海章秉持阶级斗争动力说。他说：“刘勰看不到一切社会制度，都有其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由于圣人的制作。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是阶级斗争，是人民群众集体的力量，并不是圣哲的个人。而所谓教化伦理，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势产生出

① 黄海章.黄叶楼诗[M].旅港梅州中学校友会,香港印刷,1986.

② 黄海章.漫忆平生[M]//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322.

③ 黄海章.漫忆平生[M]//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322.

④ 黄海章的其他论文可以参见:论刘勰的文学主张——文心雕龙研究之一[J].中山大学学报,1956(3);刘勰的创作论和批评论[J].中山大学学报,1958(1);文心短论[J].学术研究,1963(2).

⑤ 黄海章.续《文心短论》[J].中山大学学报,1963(4):85-95.

来,客观情势变迁了,教化伦理如果仍旧不变,适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所谓‘玄圣创典,素王述训’,也并不能为万世之师。而儒家所视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六经’,也不能成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他运用儒家的思想来扭转南朝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颓风,无可否认是有其进步作用,但把孔子和六经抬到天上,则纯乎宗教家迷信之谈。而且把文学当做经典的附庸,《序志》篇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不承认它有独立的地位,于是乎‘儒家之道’,便压倒一切,我们只要做一个好好的孔教徒,发挥一些‘教化伦理’便得了,这些地方,不能不提出来加以批判。”^①上述观点中,黄海章认为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伦理教化应该适应社会的客观形势,因而反对过分抬高孔子和儒学诸经。同时,他也坚持文学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反对把文学当作经学的附庸。

在文本分析中黄海章同样贯彻阶级论的立场。他认为:“《物色》篇对‘情景交融’的境界,是有所体会的。但由于刘勰受到了历史和阶级的局限,看不到作者所谓‘情’,即是阶级意识的表现。一切景物的描写,都无不有作者的阶级意识渗透在里边,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文学存在。所以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山水田园诗,表面上似乎不着主观的色彩,实际上还打上阶级的烙印。不把作者的情感,赋予阶级的内容,还是空空洞洞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否则便会走到资产阶级‘写真实’一条反动的文学道路上去。”^②由前面所述,黄海章的批评观点中有鲜明的阶级论印记。同样的看法还体现在他对《人间词话》“境界”的看法,他认为,王国维的所谓“真感情”的内容“即是作者喜怒哀乐真实的情感,但它并不具备阶级内容”。黄海章对此评论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感情无不具有阶级性,各个阶级的阶级感情,也是各不相同。”^③他的理由是:“既然各个阶级的阶级感情,都是各不相同,决没有抽象的‘真感情’存在。又由于各个人的阶级意识不同,因而对客观事物,就各有不同的爱好。诗人笔下的‘真景物’,究竟不同于自然的本身,而是透过诗人的感受之后,再反映出来的自然,因而也就不可能不包括诗人的阶级意识和美学观点在里面,因而所谓‘真景物’的描写,也决然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固然没有接触到‘我’之阶级内容;所谓‘无我之境’,则不但抹煞了写景诗的阶级性,而且和他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主张违反。他的‘境界’说,实在还跳不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范畴。”^④从今天的文学批评标准看来,人们会指出黄海章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局限,毕竟这是毛泽东时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突出特点。一个时代的局限性在于:第一,把阶级论作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评判标准,排斥所有与之相左的观点。第二,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寻找直接的决定关系,从而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论分析的套用与图解,以至遮蔽了人物情感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忽视了文化的丰富性。黄海章的局限在于,他的文本分析和文学史认识囿于阶级论成见,形成了某些偏颇片面的看法。

然而,有人认为黄海章简单地把唯物与唯心、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红线,从而形成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性的种种判断。本文认为,对于黄海章来

① 黄海章.续《文心短论》[J].中山大学学报,1963(4):85-95.

② 黄海章.续《文心短论》[J].中山大学学报,1963(4):85-95.

③ 黄海章.《人间词话》札记——谈“境界”[M]//姚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24.

④ 黄海章.《人间词话》札记——谈“境界”[M]//姚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24.

说,他虽然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也无法规避强制性的要求,但是并不见得是亦步亦趋、简单套用。听过黄海章上课的学生说:“记得黄海章教授曾在课堂上自我欣赏地说:你们从我的讲稿中是找不到马列主义词句的,但我的分析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大意)。”^①即使持有马列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并非机械套用,而是灵活化用。他对思想观点的领悟与运用同样是基于逻辑性和学理性的思路,而并不是生吞活剥、牵强附会。

三、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黄海章的文学批评观念除了有上述较为鲜明的主流立场之外,也还有大量的思想成果值得结合事实进行辩证分析,从而去芜存精、去伪存真。

虽然黄海章在中山大学课堂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稿与196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在内容上相差无几,但是黄海章的文学批评思想在1958年与1963年得到的评价却并不完全一致,这与特定时期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松紧程度有关。1958年黄海章的学生们在大跃进激进路线的影响下,激烈批判老师的观点。但是并不影响1962年《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出版之后,黄海章因此获评为广州市先进工作者。1963年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政治路线和文艺方针,学术气氛有所缓和,批评的态度更为客观和中允。探讨1958年和1963年这两个时间点不同的批评观点,既可以明白不同时代风气的影响,也可以明白黄海章文学批评观念在激进与保守,也就是政治规训与学术自律之间的思想张力。

(一)“大跃进”时期大学生的激烈批判

196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除了郭绍虞对原有著作的改写,新著则有中山大学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②和复旦大学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1962)上自从先秦诸子,下至王国维,纲目清晰,条分缕析,简明扼要,要言不烦,该书是他在中山大学上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在1958年总路线的激励之下,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学术批判,对具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学者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各系所组织学生在教师的讲义中查“白旗”和“白点”,黄海章的讲义也是批判目标之一。这种政治挂帅、气势逼人的批判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尊师重道的传统伦理和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

据《中山大学校史》记载: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全国各行各业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一时之间,校内气氛紧张,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纷纷“出炉”。运动的浪潮席卷中山大学,从6月下旬到8月下旬两个月时间^③康乐园内贴出的大字报据载高达7662件2096张。^④

①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② 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③ 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274.

④ 中山大学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改革运动总结报告[M].中山大学档案馆,1958.

毛泽东时代的学术著述流行标举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指导,然而黄海章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你们从我的讲稿中是找不到马列主义词句的,但我的分析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大意)”。学生们也确实发现他的中国文学史整部讲义里面毫无马列主义的词句,学生抓住他的后半句质疑:“但分析是否完全合乎马列主义的呢?我们发现在讲稿中有许多问题,甚至有些是比较重大的问题。”^①他们发现有五个方面的问题,认为“显然都是违背马列主义的观点的”。^②

1. “在讲稿中,没有具体体现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学生们认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很明显地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学生们的这一观点来自矛盾的《夜读偶记》。而黄海章对于这一基本线索“只是在讲稿的导言中空泛地谈了几句,而在以后的具体讲述中,却没有具体体现出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反动的文艺批评家,只字未提,好像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就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根本就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似的。更奇怪的是明摆着某些文艺批评家有消极的反现实主义的一面,黄先生也不提出来分析批判;甚至还为他们那些消极的东西饰以积极的外衣。像对曹丕、陆机等人的评述,就是如此。他们的文艺批评有些是正确的,但有的是错误的,反现实主义的。他们往往是重艺术,把艺术技巧作为文章好坏的标准。黄先生对他们的评述就只是抽出好的一点点,来加以发挥。于是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曹丕、陆机他们也是很先进的理论家。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就被抹煞。试问黄先生,这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吗?”^③从学生们的批评恰恰可以看出,黄海章并未机械地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发展这一论述,而是同时看到了文学性标准的重要性。

2. “对古代批评家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

学生们认为:“因为古代文学批评家由于生长在封建社会里,他们的观点就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忽略这一点将是很错误的。可是黄先生却很少能够用阶级观点去评述分析。”他们批评黄海章在讲述每一个古代批评家时只是从他们的主张中摘录某些语句,再用自己的话复述一次,至于他们的见解的深处带着什么样的阶级色彩,却很少去管了。学生们举出了如下实例:“在谈到王充时,黄老师指出他重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这种主张,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但他忽略了:他重视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抑或其他?如黄先生肯定白居易的‘有教于教化’的理论,而这种‘教化’是什么样的‘教化’呢?是封建的教化抑或其他?却不去管了。对韩愈的‘文以载道’的主张,也是肯定的多,批判的少,到底他的‘载道’是‘载’什么‘道’,这种‘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无具体的分析批判。韩愈的‘文以载道’的理论对于反对形式主义说来,在当时虽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的‘道’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伦理道德,他的主要论著《原道》就是实例。”^④对于上述现象,学生们质问黄海章:“为什么不加批判呢?”学生们要求彻底贯穿阶级分析法到任何问题,而这样不视具体情况、机械搬用的话,实际上难免造成方法与对象之间以偏概全,其结论自然捉襟见肘。

①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②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③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④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3. “主观唯心分析法——美化古人。”

学生们认为：“黄先生只是摘录一些古人的主张，而很少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批判。由此便又产生一种谬误——主观唯心的分析法。”^①其具体表现是：“有许多古人的文学主张，黄先生往往从自己主观出发，为其添枝加叶。甚至把我们今天的一些看法加在里面，使得那些古人的‘见解’正确起来，全面起来，使人觉得似乎现代的批评家还不如古人，马列主义的理论还不如古人的完整，从而就把古人的片言只字奉为经典。这一点，很突出地表现在对刘勰的文学主张的评述上。黄先生说刘勰五大文学主张指出了：文学与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认为内容决定形式；论文要兼顾作家的个性及艺术修养；文学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等等。”^②学生们提出的批评原因是，他们不能接受黄海章肯定古人的思想，认为这样“使人觉得似乎现代的批评家还不如古人，马列主义的理论还不如古人的完整”。可见学生们是为了维护一种观点的真理性而反对，也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并不是基于事实和学理而论辩。

学生们认为，黄海章将刘勰的文学主张视为完美无缺的，对其他一些古代批评家如王充，也是如此看待，说王充关于内容与形式的理论与今天的说法完全一致。学生们还认为，韩愈的“不平则鸣”，并非人们受到封建的压迫感到不平时就鸣起来。他们认为，韩愈一贯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中人，有些时候即使对人民有怜悯之情，也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除此之外，学生们认为，黄海章对曹丕未免过分美化。^③总之，学生们认为黄海章对历史人物的阶级立场的揭示不够彻底。今天看来，在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上，国家意识形态试图将新时代与“保守的、落后的、封建的”旧文化彻底分割，从而证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即进步的、正确的、光明的、伟大的。这种新旧文化的切割思路贯彻的是激进的政治意志，忽视了文化作为生命有机体具有延续性的特征。如果将阶级论分析方法彻底贯彻，甚至机械运用的话，最终可能的结果是，古人的思想和文学成就经不起高度蒸馏式的提纯，因而显得乏善可陈。

4. “以今为古，替古人服务。”

学生们认为：“学古为今，叫古人为今人服务，我们学习古典文学遗产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大跃进”时期反对厚古薄今的历史态度，要求历史遗产为现实的目标服务。“但黄先生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而把绝大部分的文字放在注释工作上，替古人来作注释，作翻译，先引用一段话，再来复述其内容，就算完事。不但黄先生自己长期以来在为古人服务，而且他还要用我们今天的文艺观为古人服务。他不是从古典文学遗产中吸取其精华以建立和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而是拿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文艺观点去解释和美化古人的文艺理论。”^④学生们认为，黄海章“我注六经”的做法过于保守，应该采取“六经注我”的实用主义方法。

黄海章肯定刘勰的“六观法”：“……六观法也包括了作者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全部，他一方面反对只从词藻、声律来说明文学的优劣，一方面也反对只有伟大的思想感情的内容，而

①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②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③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④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无优美的形式来表达的粗糙文章。但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于形式……”^①他在课堂上说,“六观法”可以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齐观。他还说:“现在批评文学的人,往往先立下‘现实性’‘人民性’一类的公式,然后从作品中断章取义,来证实他的主张,这只能成为主观的一种意见,而不能是合乎客观的批评。”^②学生们认为,黄海章上述对“现在批评文学的人”有苛责之嫌。其实,黄海章平等地看待古今文学理论,反对以个人主观的、片面的“意见”替代“合乎客观的批评”,他的这种“客观”立场也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政治实用主义的先入为主和概念滥用。

5. “迷信传统的错误说法。”

学生们认为,黄海章迷信传统看法。“黄先生对刘勰的天才论就不敢批判。而对陆机的文学主张的讲述,更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黄先生不加批判地吸收了陆机的形式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理论”。^③“总的说来,黄先生的文学批评史讲义不是告诉同学们应该怎样利用古人为今人服务,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来恰如其分地评论古人,给古人以正确的评价,而是钻到古书堆里,替古人作注释,当翻译,要今人为古人服务,美化古人,叫人向后看。因此我们认为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④面对思想繁富的传统文化,深处政治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黄海章在古今思想的平衡上、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拿捏上、学术传统与时代风潮的把握上,无论是跟进还是独守,都难免处处不讨好。

上述学生们五个方面的批评,总的说来可以概括为四个主题: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论,阶级分析法,唯心主义思想以及厚古薄今批判。其思路可以用“只是……而没有……”这个话语模式来概括,也就是一方面肯定黄海章虽然有一定的建树,但是在思想观念、论证方式、教学方法等方面不够彻底,或者说过于简略,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黄海章的讲义之所以成为学生们的“靶子”,其原因除了与他的思想观念的确还不够激进以外,笔者认为,第一,与他个性化的教学方式是有关系的,他的文学教学方式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体悟式批评。黄海章1981年在《漫忆平生》中说:“我如果把我所要写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在课堂上讲授时‘照本宣科’,就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为取得教学效果起见,可以一边让学生留心教材的内容,一边把许多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用口头进行讲授,或摘录一些笔记,这样,可以吸引学生,得到好的教学效果,这样教了几年,也还算马虎应付得来。”^⑤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来自课堂讲稿,他对于何者需老师书上写、何者需老师当场讲、何者需学生读进行区分,提倡学生自主、师生互动,反对照本宣科满堂灌。据黄海章的学生黄天骥介绍:“海老给我们讲唐诗。他身体瘦小,却声若洪钟,讲到激动处,唾沫直飞到讲坛上。他讲课的内容十分简洁,一是一,二是二,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对一些名篇,他不作分析,往往是摇晃着身躯,高声朗诵一遍,完了便问:‘哪一句最好?’若某甲同学起来回答,不

①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②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③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④ 欧麟,宛毓英,孔德明,等.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N].光明日报,1958-11-30;E6版.

⑤ 黄海章.漫忆平生[M]//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323.

合海老的想法,他就摇头;某乙同学又站起来,说另外一句才好,海老满意了,便点头。然后说:关于对这首诗的评价,同学可以看什么什么书。这样一首诗的讲评,算结束了。”^①这是黄海章教学上不着文字、随机点拨的金针度人之法。黄天骥评价道:“海老讲书,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讲得并不动听,但很有启发。他讲诗,着重点在让学生自己体悟,而极少加上教师的意见。即使表示教师的看法,也点到为止。”^②这是灌输法与启示法之间的差别,所谓“教”是为了“不教”,或者说教师通过火种去点燃学生思想。

第二,黄海章上课“所说的”与著作、论文“所写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备受批判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主要是学生们记录整理的黄海章课堂口头讲述,其内容与后来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是有出入的。口头讲述的特点是:往往听从内心、随意发挥,遵从文学感觉和个人趣味,而不墨守外在政治规范;强调以心悟道的个体化情感体验,而不是理论教条先入为主的约束。陈平原说,黄海章的研究方法,“这种重体悟能自得而不大重书本重理论的倾向,仍可能暗含玄机。先生的这种学术路数,与近代以来日渐专业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故在学界显得有点‘落伍’。好在先生从不追新潮,政治上、学术上都力戒‘从风而靡’,而是追求‘内有定见,外有定力’”。^③ 黄海章的文学教学尊重学生个人主观感受的独特性,不以标准答案为约束,实际上维护了文本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

从学生们的批判动机、思路与方法来看,他们显然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虽然黄海章的文学批评也有时代政治的印记和影响,但是让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话,却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以文学的方式谈文学,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谈政治,是他的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底线。学生们根据那个时代的政治标准和文学标准,对黄海章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大加挞伐。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看来,学生们的这些批判资料恰恰反映了黄海章外部政治理念的制约和个人内心学术立场之间的裂隙,也反映了他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个性。

(二) 1963 年汤大民的温和肯定

“大跃进”的激进风潮渐趋平和之后,何其芳 1959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发言,纠正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他首先提出文学史的编写的总体原则应当是:“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和作品评价恰当。”^④他指出,北大 1955 级学生集体写作的《中国文学史》把很多作家和作品都划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把所谓“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全部否定,“中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就为之减弱了。这种过多的否定虽然不能完全由这个公式负责,但从这种流弊也可以看出它有问题”。^⑤ 他说:“与其要一个不合乎事实的不正确的公式,我觉得还不如暂时不要公式。”^⑥何其芳就中国文学史研究提出的

① 黄天骥.人淡如菊——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M]//黄天骥.中大往事.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222.

② 黄天骥.人淡如菊——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M]//黄天骥.中大往事.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222.

③ 陈平原.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J].读书,1993(9):146-151.

④ 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M]//何其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82.

⑤ 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M]//何其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97.

⑥ 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M]//何其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85.

原则、观点与方法,与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何其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他的观点对“大跃进”之后的学术风向的扭转也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从下面汤大民的持平中允的学术评论也可以看出。

在20世纪60年代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编写中,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观念调整力度并不大,他认为:“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①对此,当今学者李平认为:“对于这种‘左’的倾向,现在的学者往往嗤之以鼻。但我想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批评家思想意识及其批评理论的复杂性,如‘在过去号称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相反,‘在某些落后的文学批评家中,有些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要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二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者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文学批评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②汤大民1963年关于《简史》的评论可以为李平的观点找到论据。也就是说,《简史》存在一些时代极“左”的印记,尽管如此,也不可全盘否定。相对而言,汤大民1963年写的这篇批评文章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结束之后,口气相对学生们的强烈质问,温和理性许多,态度也相对平实。

汤大民是当时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助教,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③他总的看法是,我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总结了历代作家的创作经验,鲜明地贯穿着文学领域的两条道路斗争。当然,“鲜明”并不意味着“简单”;恰恰相反,文学批评史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呈现着异常复杂的状态。《简史》在《概说》中说:“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显现出来。”汤大民认为:“书中在具体阐述时,虽还有不足之处,也扣紧了这一规律,并初步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④具体观点如下:(1)文学批评理论的两条道路斗争,固然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决不能等同。“《简史》重视这种复杂性,肯定了像公安派打倒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和袁枚反对格调派的进步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于公安派主张文学脱离现实斗争、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也有一定批判。”^⑤(2)批评史上围绕着浪漫主义文学现象展开的论争也相当激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简史》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一微妙的斗争,不仅否定了班固的正统思想,而且批评了王逸抹杀《离骚》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简史》由于没有简单地把积极浪漫主义归结为现实主义,因而就比别家批评史更重视围绕浪漫主义文学论争的理论和批评。^⑥

陈平原认为:“五十年代后,先生自觉接受思想改造,著作中大量出现‘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等新概念。可毕竟是‘从旧社会中来’,稍一不

① 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3.

② 李平.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论[J].文艺研究,2003(4):51-60.

③ 汤大民当年的学术论文还有:王国维“境界说”试探[J].南京师院学报,1962(3).

④ 汤大民.简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J].学术研究,1963(5):101-104.

⑤ 汤大民.简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J].学术研究,1963(5):101-104.

⑥ 汤大民.简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J].学术研究,1963(5):101-104.

慎,便露出庐山真面目。在一大堆远非先生所能熟练驾驭的新概念的掩护下,先生时能表达自己的体验与感悟。”^①如果简单地认为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往往从预设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结果导致史从论出、以论代史的结果,这也未免有些偏颇。应该说,对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批评,黄海章有选择地接受,同时,某些他付诸批评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未必完全是出自内心,难免有迎合之意。笔者认为,绝对地判断黄海章是政治化批评或者个性化批评,都未必恰当,应该结合历史情境来深入理解批评者心意。

结 语

结合黄海章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整体分析,可以把握他思想观念的转型与嬗变。黄海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接受了某些具体的政治观点,例如阶级论、唯物论、反映论、“主流说”等,但是基本的学术原则和方法则并未改变,而且更加坚定。^②

1949—1976年期间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承受着过于沉重的政治压力,因而与主导思想悖逆的言论、思想往往很难出现。当下的研究者对这一时段的人物的评价,通常有两个较为偏激的看法。一是过多责难当事人及其研究成果顺从政治意志而缺乏个性和新意。二是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挖掘当事人及其成果的叛逆性因素。也许这两种看法都流于简单片面,因而回到历史现场,避免过分贬低和拔高,实事求是、知人论世较为妥当。除了个别特例以外,求全责备其平庸与过度夸大其独特,也许都远离其本来面目。据吴承学介绍黄海章晚年心态说:“黄先生征引清人颜元的话:‘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颜习斋言行录》)以为可作学者的座右铭。”^③由此可见黄海章以追求学术真理为学者本分。同时,黄海章引用刘勰的论述,认为“研究工作中与前人的‘同’与‘异’,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客观的‘势’与‘理’所决定”。他说:“刘勰是划时代的大批评家,但自称《文心雕龙》的理论和传统有同有异,‘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序志》)^④如果联系黄海章的学术经历来看,他之所以与前人或者当时文学观点相同,实乃客观情势所决定。而之所以能够发表独到见解,又有坚持学术真理的主观原因。黄海章曾经指出:“过去对处理文学遗产的态度。曾发生两种偏向:一九五八年教学改革以前,是肯定太多,缺乏批判的精神,一九五八年教改后,则又否定太多。这两年来,‘左’倾的态度纠正了,又逐渐到右倾方面。有不少同志,把古人现代化了。”在指出这一现状的同时,黄海章也诚恳检讨自己:“美化古人的毛病,在一九五八年教改以前,我犯了不少,经同志们提意见以后,已逐渐改换过来,在现还值得我们注意。”^⑤总之,从当代文学批评史视野来审视黄海章的文学研究生涯,有必要实事求是清理黄海章的学术特色、成就与贡献,并且将这一精神财富化为

① 陈平原.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J].读书,1993(9):146-151.

② 关于黄海章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更多内容可以参见拙著:十七年文学批评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③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J].学术研究,1986(4):122-123.

④ 承学.黄海章教授谈治学[J].学术研究,1986(4):122-123.

⑤ 黄海章.关于文学遗产批判与继承的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1963(3):10-12.

当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资源。也需要不为尊者讳,理解批评者及其观念的时代局限。

Huang Haizhang'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S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Huang Haizhang'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not only spans a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also focuses on specific events. His research activities mainly consist of the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and the writing of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Closely related to his complicated life experience and rich spiritual experience, his literary concepts demonstrate a historical multi-layered-ness; the alignment with the state ideology critique, th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al radicalness and academic conservatism, and the unity between scholarly individuality and moral integrity. In order to examine Huang Haizhang's literary research care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we need to both objectively investigate hi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and candid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his ideas, so as to transform his intellectual heritage into a resource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oughts.

Keywords: Huang Haizhang, *Wenxin Diaolong*,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Poems of Yellow Leaves Tower*

(学术编辑:贺昌盛)

李松,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